

边缘人的救国路

——容闳救国思想探析

岳亮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1)

摘要: 容闳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毕业于美国一流大学的留学生, 他为了中国的自强与发展奔走呼号了一生。但作为一个徘徊在中西边缘的人物, 容闳与现实中的中国, 总是在若即若离之间。尽管边缘人的境遇使容闳的救亡道路颇为曲折, 然而终其一生, 容闳始终都能紧跟时代潮流, 执著地探索救国的真理。

关键词: 容闳; 边缘人; 救国思想

中图分类号: K8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4970(2007)04-0101-03

收稿日期: 2007-02-23

作者简介: 岳亮(1982-) 男, 云南弥勒人,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19世纪中叶, 当西方资本主义迅猛发展, 凭借其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中国的国门时, 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与外界隔绝、闭关自守的封建古国。腐朽没落的满清贵族竭力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另一方面, 英法侵略军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而复杂, 中华民族正处在一种十分痛苦和艰难的境地。

1854年11月13日, 容闳从纽约乘“欧里加”号货船回国。他19岁离开中国, 在美国8年, 回来已是26岁了。当容闳怀着赤子之心回到中国, 踌躇满志欲改造中国之时, 却没想到他选择的是一条何其艰难的道路。国内民众的卑劣、封建官场的黑暗、传统道德的保守, 使他无可奈何。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 容闳始终未能很好地融入中国社会, 他以一个徘徊在中西边际的边缘人身份, 先后投身于洋务运动、变法维新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以探寻救国之道, 由教育救国转向政治救国, 由参与温和改革转向反清革命阵营。虽然屡遭挫折, 但他百折不挠, 在封建专制守旧的社会环境中, 一直与时代共进, 直到84岁病逝于异国他乡。

一、教育救国

刚回国的容闳把自己所受的先进教育和中国传统文化比较, 深感中国教育现状的落后, 于是主张“教育救国”, 提出幼童出国留学计划, 明确表示这一计划的目的是为国家储蓄人才。他之所以把教育看得如此重要, 正是由于他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 较早地意识到了教育与知识, 与国家富强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 也最早认识到了新学新知的价值和意义。尤其难得的是容闳把西学与救国强国联系在一起, 认定只有引进“西学”,

发展教育, 培养有用人才, 才是中国自强自救的根本出路。容闳“以西方之学术, 灌输于中国, 使中国日趋于文明”^{[1](P73)}的信念和决心, 在当时普遍视西方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 对西方文明嗤之以鼻的中国, 无疑是难以实现的。这位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第一位中国留学生, 中国最早的海归知识分子, 归国后却并不为祖国所接纳。他的美国一流大学文凭在国内远不如秀才、举人的“功名”受重视, 当时的官府衙门甚至不知“大学生”为何物。他只能凭借洋人关系到洋人主事的地方谋职。容闳先后在美国代理驻华公使手下任书记官, 为香港最高法院、上海海关担任译员, 之后又在英国一家私茶公司任译员。职业多次变动都寄人篱下, 郁郁不得志, 一度失业在家, 以译文度日。

容闳归国初在广州目睹了两广总督叶名琛残酷镇压响应太平军的民众, 对洪杨起义军深表同情, 甚至“几欲而为之响应”。^{[1](P83)}咸丰十年(1860)年11月初, 容闳在归国奔走数年毫无成效的情况下, 秘密潜入太平天国辖区深入察访。容闳此行既是他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素怀同情心使然, 也是他个人意欲有所作为的主观动机使然。用他自己的话说: “我去的目的是想了解一下太平军的性质, 他们这批人是否有能力建立一个新政府以取代清朝, 使我的宿愿得以实现”。^{[1](P84)}11月19日得到干王洪仁玕的接见, 容闳当场向太平军献策七条: 一、依正当之军事制度, 组织一良好军队; 二、设立武备学校, 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 三、建设海军学校; 四、建设善良政府, 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 为各部行政顾问; 五、创立银行制度, 及厘定度量衡标准; 六、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 以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 七、设立各种实验学校。^{[1](P70)}这是容闳首次向权势

人物呈献他思考已久的救国方案。其中第二、三、六、七条专门论及改革教育制度,创办军事学校和各类技术学校的重要性,充分体现了容闳的教育救国宗旨。遗憾的是,尽管洪仁玕见识颇广,对容闳所言七事也深感重要,但洪仁玕名为总理朝政的干王,其实并无实权,他自己的心血《资政新篇》于一年前公布后,也不过是一纸空文。此时的太平天国已是强弩之末,忙于战事,根本无暇顾及这些改革方案。

太平天国之行使容闳颇为怅然,他拒绝了洪仁玕的盛情挽留,转而投向了正在兴办洋务的洋务派官僚。容闳先是奉两江总督曾国藩之托,专程赴美购买机器装备江南制造总局。两年后,容闳不辱使命归国,受到曾国藩信赖,专折保荐他为江苏候补同知,官五品。容闳以此资格在江苏省行政署作译员,至此可以说正式进入中国官场。容闳深感曾国藩乃开明务实之士,恪守“欲速则不达”的古训,进而建议“于厂旁立一兵工学校,招中国学生肄业其中,授以机器工程之理论与实践,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2] (P12)}这时的容闳还没有直接提出派遣留学生的计划。

容闳好友兼上司江苏巡抚丁日昌深知容闳其意,经容闳委托,向曾国藩提出了派遣留学生的设想。曾国藩在办理完天津教案后特意召见了容闳,答应领衔上奏,并商定四条:1.选派总额为120人,分四年出洋,每批30人;2.在上海设立预备学校,培训幼童;3.筹定留学费,确定留学期为15年。

1870年,清政府批准了容闳的教育计划,这在当时被看成是开新纪元之事。留学计划的实施,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不仅开创了我国公费派遣留学生的先河,而且对以后中国人出洋留学,走出国门看世界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进步性,对后人乃至当代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72年,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30名官费留学生,在监督陈兰彬率领下,在上海登轮出洋前往美国,3年后第四批留学生抵美。容闳以副监督的身份负责具体事务,他与留学生关系情同父子,视办理官费留美一事为人生“最大事业,亦报国之惟一政策”^{[1] (P20)},因而呕心沥血,任劳任怨。

在当时的中国,任何一种改革都有赖于权势人物的推动。尽管容闳的思想与洋务派有着本质的区别,但由于洋务派把持着中央至地方的权力,只有他们有条件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把社会改革思想付诸实践。因此,洋务派就成为不可替代的勉为其难的人选,而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的支持也是容闳推行教育救国计划的最大政治保证。但是,洋务派心目中的培养目标,是要培养一批略懂洋务而效忠于封建制度,为大清王朝服务的知识分子。留美幼童深受美国教育和社会的影响,逐渐形成自由独立、民主平等的思想,很快就“美化”了。这显然与国内旧有的伦理道德观念

相违背,因此招致守旧派的猛烈攻击。守旧派批评幼童“抛荒中学”,“腹少儒书,德性未坚”^{[3] (P165)},“适异忘本,目无师长,固无论其学难期成材,即成亦不能为中国用”。^[4]连曾纪泽这样的开明人士也认为:“幼童未读中国圣贤书……于国家无大益也。”^[5]幼童回国后,李鸿章的评语是“洋气既深,华文太浅”。^{[6] (P24)}1881年,清政府撤销留洋肄业局,全体留学生被迫回国,标志着容闳早期借西学拯救中国理想的破灭。

二、维新救国

甲午战争失败后,全国人民群情激奋,掀起反对割地求和,拒签马关条约的浪潮。容闳从教育救国计划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再次向清廷进言要借西方列强之势抵制日本的侵略,但又没有实现。这时的容闳看到了清政府腐败至极,认为中国要想富强“非行一完全之新政策”。他的新政策的内容包括:

其一,政治方面。由政府聘请有经验的外国人担任外交、财政、海军、陆军等重要部门的顾问,将他们的合理建议付诸实践,并借助他们培养有才华的中国学生。容闳明确表明要效仿西方政体来对中国腐朽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造。

其二,经济方面。甲午战后,国家危机日深,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容闳又提出按照西方法律创办国家银行,购买机器铸币,发行国债,以缓解经济危机。同时还提出修筑津镇铁路计划。

这些带有明显资产阶级色彩的变法维新言论、计划,因顽固派的阻碍而未能实施。因此,当他的同乡康有为携其弟子梁启超如异军突起发起戊戌维新运动时,容闳也在北京就地参与,积极鼓吹变法维新。他高度赞扬光绪帝为中国自古以来未有之明主,同时与维新派频繁往来,积极支持和参加维新运动,他在日记中写道:“予之寓所,一时几变为维新党领袖之会议场所。”^{[1] (P25)}无疑,这时的容闳已完成由洋务派向维新派的转变。只是好景不长,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囚禁光绪,捕杀维新派分子,这场曾经满载了希望的变法运动仅坚持了103天便告失败。容闳因庇护维新派人士,亦在顽固派密令逮捕之列。他向美国公使求救被拒绝,无奈只得化装潜逃到上海租界。

戊戌变法终告失败,容闳的救国理想又一次化为泡影,使他异常痛心。容闳深感改革的异常艰难,一度认为中国政治可能出现大的倒退。但是容闳并没有因此而丧失救国的信念,其政治态度反而日趋强硬,逐渐由赞成变法转为支持革命。

三、革命救国

自《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完全变成了“洋人的朝廷”,伴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资产阶级革命

在国内风起云涌。曾经贵为天朝的清政府已经陷入困境,随时都有可能崩溃。

1900年7月,容闳在上海参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人士唐才常等人组织的“张园国会”,被选为会长,他积极参加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计划。随后自立军起义遭张之洞镇压,唐才常也被张之洞捕杀,容闳被迫逃往日本避难。逃亡途中容闳在轮船上巧遇小自己38岁的孙中山,这是他们二人的初次见面。孙中山阐明了必须首先推翻清政府,中国的改革才能实现。容闳很受启发,多年的实践也使他认识到,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确实难以走通。可以说容闳这次与孙中山的会面,是他的救国思想由改革向革命的转变。但他并没有真正划清改革与革命的界限,还主张联合各派政治力量包括康梁的保皇派,共同推翻清王朝。

然而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康、梁保皇派反对和破坏革命愈加激烈。容闳逐渐觉悟,并开始同康、梁断绝关系,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谴责了康有为及其保皇党。1909年月1月,容闳揭露了康有为私吞华侨为支援维新运动捐献的大笔捐款,指出康有为“意在权势和财富,而不是改造中国”^{[7] (1431-432)},与康、梁彻底决裂。与此同时,容闳更加拥护和支持革命,主动向资产阶级革命派靠拢。他把曾经积极支持康有为的美国军事家荷马·李及财政界人士布思介绍给孙中山,使这两位美国友人由支持保皇派转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1909年孙中山到美国进行革命活动,按约定与容闳第二次会晤。这是他们生平的第二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容闳向孙中山提出了酝酿已久的“中国红龙计划”,准备筹集500万美元、10万支枪和一亿发子弹,为反清武装起义用。尽管这一计划终因筹款未能到位而搁浅,但可看出已年逾古稀的容闳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支持依然热情不减。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并取得胜利,远在美国哈特福德家里病榻上的容闳欢欣鼓舞。他给友人谢瓚泰写信请其转达向孙中山的祝贺。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特致函容闳,诚挚邀请他归国共商大计。容闳发来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祝愿“中华民国创立一完整政府,以巩固我幼稚之共和”,最后表示:“诚挚地祝贺你!我为能活到看到你当选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之日而欣喜!”^{[8] (115)}1912年4月21日,作为一名孙中山及新生民主共和国的坚决拥护者,84岁高龄的容闳与世长辞。临终前他将自己在美国的两个儿子介绍给孙中山回国服务,以完成自己未竟的心愿。

对于晚清中国来说,容闳本是不可多得的近代型人才。他深深地爱恋着自己的祖国,一生致力于在中国建立西式的文明社会和先进制度。但是,在那仍然重视传统科举功名的时代,作为“洋学生”的容闳实在难以介入晚清中国社会的权力结构。容闳自小接受西

式教育长达17年之久,他崇拜美国的文化教育和制度,并且入了美国籍。但容闳一直怀着一颗赤诚的中国心,从未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在与外国人或外国政府打交道的时候,容闳始终坚持捍卫中国人的尊严和中国的利益。因此,尽管他入了美国籍,外国人也把他当中国人看。(1898年美国国务卿就曾训令美驻华公使否认容闳的美国公民资格)。虽然容闳回国后也极力找机会结交上层权势人物,把救国的理想寄托于达官显贵,但是他终身引以为豪的“耶鲁大学中国第一毕业生”的洋学生身份,以及他信仰基督,入籍美国,迎娶美妇的行为,恰恰妨碍了他的各种努力和效果,“引起了许多同胞的极强烈的责难和规劝”。^{[9] (1420)}“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过于西化的容闳终归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边缘人”。

容闳从美国结束学业回国后,首先投身于洋务运动。但洋务派官僚因循守旧,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方针,只学习西方的皮毛,结果被西方列强打得落花流水,从此萎缩不前退出历史舞台。而容闳却能够摆脱洋务阵营的羁绊,成为一名颇有影响的维新变法的鼓吹者。但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的变法运动,喧嚣一时,昙花一现,即被封建顽固派所镇压,成为隔岸呼喊的空谷回音。此后,康、梁组织保皇党顽固地反对革命,成为革命的绊脚石。而容闳却又能脱离维新改良的营垒转而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最终完成了由维新向革命的转变,临终之前,迎来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10]作为一个一生徘徊在中西边缘的爱国者,容闳的救国思想由教育救国向维新救国转变,最后向革命救国转变,经历了两次伟大的转变。因此,容闳思想最大的特点,是能够随着历史的潮流不断前进,这是他的伟大和闪光之处。这种极为可贵的与时俱进的品质,连同他向西方学习的精神,他矢志不移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实践,将永远值得后人学习。

参考文献:

- [1] 容闳.西学东渐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5
- [2] 容闳.我和中国和美国的生活[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 [3] 光绪七年二月初六日出使美日密国大臣陈兰彬折[A].洋务运动:二[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 [4] 留美中国学生会小史[J].东方杂志14(12).
- [5] 曾纪泽遗集[M].长沙:岳麓书社,1983
- [6] 复黎召民京卿[A].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C].
- [7] 杨国标,等.美国华侨史[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 [8] 邓丽兰.临时大总统和他的支持者——孙中山英文档档透视[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
- [9] 洋务运动:八[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 [10] 任贵祥.从渐变以质变——略论容闳思想的两次飞跃[J].安徽史学,1999(2).

[责任编辑 伍纯初]